



怀念王永兴先生

阎步克

2008年9月15日，王永兴先生在北京辞世。又一位德高望重的史学宿儒，告别了莘莘学子，这是令我们怅惘悲痛的。王先生享年95岁，可称高寿；他在学术史上留下了一份厚重的学术遗产，如《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》、《唐勾检制研究》、《陈门问学丛稿》、《敦煌经济文书导论》、《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》、《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》、《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》等。“生也有涯，知也无涯”，不是所有人的有限一生都能如此的。

我初次见到王永兴先生，是在大学本科之时。1978年11月，王先生从山西调到了北大历史系。其时他已六十多岁了，但对教学工作依然勤奋认真，对学生的学习与培养非常投入。记得有一次，王先生忽然走进了我们在38楼的寝室，正在宿舍中闲聊的我们当时感到很意外。王先生询问我们上课与读书的情况，记得自己很拘谨，答得含含糊糊。王先生是辽宁昌图人，说话带有东北口音，把“读书”习惯地说成“念书”，而我也是从辽宁来的，我的父辈也是那么说话的，加上王先生作为前辈学者的诚挚殷切，于是让自己有了亲切温暖之感。

那会儿自己刚从社会进入大学不久，庶事陌生，除了听课，跟教授们很少接触。王先生来宿舍，更多的是感觉意外。而今回想起来，王先生屡次来学生宿舍鼓励指导学生学习，就感叹不已了。因为自己后来也做了老师，可直到现在，也没能做到这点，没专门去学生宿舍考察学习，督促读书。很多人都听到过王先生引述陈寅恪先生的话：“学校给我薪水，我怎么



能不努力上课教书。”在后来跟王先生的交谈中,我也听到王先生说过这事。他以陈寅恪为榜样,在教书育人上不吝精力心血,堪称师表。北大历史系的《王永兴教授讣告》中有这样的叙述:“王永兴教授回到教学研究岗位后,以满腔的热情,投入到教学之中。……认真准备每一门课,讲授详尽深透,高屋建瓴。而且在课堂以外,对每一个选修其课程的学生,都进行个别辅导,耳提面命,诲人不倦。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,言传身教,王先生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,他们现在大多成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骨干,薪尽火传,桃李遍天下。”这段评价没有夸饰成份,不是套话,皆为实录。

当时王先生对我们的鼓励,一个是要好好念陈寅恪先生的书,一个是要关注敦煌学,研究敦煌文书。很惭愧,因小学五年级就遭遇了“文革”,因而多年辍学的自己,当时非常浅陋,在初读大学历史系之时,居然不了解陈寅恪是什么人。当然,随后逐渐知道了陈寅恪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大师,而王永兴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。王先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,有幸亲炙陈寅恪先生,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、隋唐史、敦煌学,后来曾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三年。王先生要我们念的陈寅恪的书,我当时找来翻了翻,觉得异常冷僻。是后来到了研究生阶段,才去认真读的。

王永兴先生殷殷期望学生能献身敦煌学研究,他表达了一个愿望:决不能让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国外”的情况继续下去了。王先生要我们研读敦煌文书的期望,自己也未能承命。因为当年的自己散漫懒惰,害怕辛苦,觉得敦煌文书像天书,望而生畏,没加入其中,错过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现在从学术训练的角度回想,颇觉可惜。其他很多同学即投入其中,得到了王先生手把手的教诲,一篇一篇、一句一句,甚至一字一字地讲解,受到了良好的训练。邓广铭先生在给我的同班学长邓小南的《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》一书的序言中还特别提到,“照实说,她并不是在我的指引之下而掌握了这一治学途径的。王永兴教授所开课程是隋唐五代史,隋唐的职官制度、隋唐职官制度中的铨选制度,属于王教授的重点讲授内容之一,使听课者均深受其益”。

我选修过王永兴先生的隋唐史课。课上,王先生往往会在黑板上大段地抄写史料,然后逐段讲解,有时候,他还会就史料中的字词提问学生。有一次就提问到我,问的是什么叫“緝熙”。当时我怎么答的,现在想不起来了,当然是硬着头皮答的,而且可以肯定是答错了。王先生纠正我,说“緝

照”就是“光大”的意思。那好像是我在大学里唯一一次课上被提问。这样的提问让学生感到压力,有了压力就得认真对待,按要求把该读的书读了,不懂的东西就得去查、去寻找解释。现在在课上,我偶尔也会提问学生。后来有学生告诉我,这让他们有点儿紧张,我就想起自己当年的情景。

后来跟王先生逐渐熟悉了。在向他请教问题时,他随时引证陈寅恪先生来回答,而且一如既往地经常叮嘱我,“要好好念陈寅恪先生的书”。王永兴先生作为弟子,一生伏膺陈寅恪先生,继承其论点学说,遵循其路径方法,宣讲其学术成绩。自己刚从“文革”过来,“文革”时所受的教育,都是鼓励青年人“造反”、“反潮流”、“与传统观念决裂”,对王先生这样恪守家法、伏膺师说的执著态度,最初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以后就逐渐认识到了,博采众家是一境,自创一家是一境,恪守一家也是一境。那种看似传统的态度,也是学术传承、文化绵延的一种途径、一种方式。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学术流派,就是这样薪火相传的。

读陈寅恪先生之书,不由得产生了若干感想,曾讲给王先生听。我觉得陈寅恪不仅仅“考证”,主要是在“论史”,即不泥于订诂考证,而是从大处着眼,由小见大,以独到的眼光,勾稽重大政治线索,发掘重大政治问题,而清人赵翼也略有此风。赵翼的《廿二史札记》,像“汉初布衣将相之局”,“王莽时起兵者多称汉后”,“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”之类,往往能以其独见启迪后人。所以我有一个感觉,在“论史”的风格、手法与眼光上,或者说在“问题意识”上,陈寅恪与赵翼有相承或相似之处,虽非陈先生刻意如此。但王先生并不赞成这个看法。他告诉我,陈寅恪认为清代史学很卑下:“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,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”;“清代经学发展过甚,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”。王先生认为,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是上承司马光的,是司马光之后的第一人。他举例说,王鸣盛认为王导“看似煌煌一代名臣,其实并无一事,徒有门阀显荣,子孙官秩而已。所谓翼戴中兴、称‘江左夷吾’者,吾不知其何在也!”但陈寅恪《述东晋王导之功业》则云:“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,统一内部,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,以抵抗外侮,民族因得以独立,文化因得以续延,不谓民族之功臣,似非平情之论。”二者的高下是绝不相同的。其实王先生在其《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》中已明确提出:“寅恪先生对宋代史学与清代史学之比较评论如此,对宋贤史学评价极高,评清代史学地位则甚卑下,则他究竟师法宋代史学还是清代史学,读者可以判明矣。”



我学的是魏晋南北朝史,王永兴先生不是我的导师,见面机会不多,但每逢见面,他总是给我以勉励,还要我注意身体。王先生每次见到我的妻子,也忘不了要叮嘱她,说阎步克身体单薄,要照顾好他。长者对后辈的期望与关怀,是我所难忘的。在探望王先生的时候,他总会讲起陈寅恪的故事,以及他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求学经历。我有时想,我们这一代以上的学人,与现在的青年学子很不相同。现在的青年学人大多是从校门到校门,从专业上说是治历史的,可是自己没有历史。而我们这一代人,以及再往上的人,却往往有自己个人的历史。不过进一步说,这几代人之间也还是不同的。像我自己吧,就总也摆脱不了身上那股知青味儿,估计那知青心态会伴随我一生。而王永兴先生那一代学者,很多人在经历了颠沛流离、风云变幻之后,依然是醇正的学者气象,令人肃然起敬。

王先生后来搬到了燕北园,小小的三居室里,用品、摆设都很朴素,甚至给人简陋之感。床头、桌边都是书,局促的空间里书籍文稿触目皆是,没有“享受生活”的物质气息,一看就是一位学者之家,念书就是一切,其他都是多余之物。不知怎么的,心里就浮现出小学课文里读到的方志敏烈士的话:“清贫、洁白朴素的生活,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。”有一次王先生对我说:“我已经退休了,不教课了,国家还每月给我三千块钱,真的很感谢国家。”这话引发了我的纷纭感慨。

王先生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,思维能力与记忆能力大大下降,有时候会不认识来客是谁。但这时候,他仍然有一个癖好,一个很多人不会有的特别癖好:念《资治通鉴》。当然,他已不能像先前那样思考钻研了,那不过是他毕生生活习惯的一种自然延续而已。我看着王先生半躺在床上,手捧《资治通鉴》,很专注地念着,一页页、一行行地念下去,心神全被笼罩在书里面,显然从中得到了很大乐趣。当时我就想,就算王先生已不能充分了解他所念的是怎么了,但他一定从中感受到了心灵的安宁,感受到了生存的意义,感受到了一位毕生以“念书”为务的学人生命的继续。当年陈寅恪先生要求他研读《资治通鉴》,他也曾为陈先生朗读《资治通鉴》;后来他指导学生念《资治通鉴》;在临终的时候,他又以念《资治通鉴》送走了人生的最后时光。

《庄子》有言:“夫大块载我以形,劳我以生,佚我以老,息我以死。”在写完这篇短文之时,再次为王永兴先生祈祝冥福,愿先生安息!

(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历史系)